

論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著 夫 捷 昂 列 · A

譯 泉 洪

行 印 社 版 出 棧 棠

論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由列寧、斯大林根據馬克思經濟學說經過科學、綜合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經驗而創造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一方面研究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途徑與方法；另一方面研究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的規律的作用與發展，以及在蘇聯盛行的各種生產關係的性質。這些關係是與資本主義下的一切生產關係，有根本原則之區別的。

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作爲一個科學部門，只有在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過程中，才能創造起來。

如所週知，馬克思與恩格斯曾經拒絕任何關於創作將來社會組織方案的思想。他們看到自己的任務是在於發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這些規律同時就是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及其必然爲新的、高級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的法則。在現實的資本主義實際中，他

們發現了無產階級就是應該完成資本主義掘墓人與新制度——共產主義建設者的歷史使命的力量。闡明無產階級作爲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全世界歷史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任務。

馬克思與恩格斯以科學證明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需。根據人類社會過去全部歷史的研究，他們得出了結論：就是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以後，首先就應該利用它把生產資料與工具變爲社會公有，藉此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把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看作充滿革命戰鬥與國內戰爭的相當長久時期，把它看作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執政的無產階級完成極複雜的改造工作，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爲此實現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與組織性質的種種步驟。

關於社會主義生產方法問題，馬克思與恩格斯主要是在個別的天才註解中加以闡明，而且這些註解，大部份都是包括在他們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著作總文中。

社會主義生產方法問題，實質上成爲馬克思與恩格斯研究的專門對象，僅在他們的

兩種天才著作中：即在「反杜林」（在論社會主義一章中）與「哥達綱領批判」中。恩格斯在「反杜林」中，如所週知，曾提出社會主義生產方法極一般的要點問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關於共產主義發展的兩個階段，曾經作了非常重要的科學發現，並且分析了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基本原則。如列寧在他的「國家與革命」著作中特別強調的：馬克思對於什麼叫作社會主義與什麼叫作共產主義，沒有作學院主義的想像定義，及毫無結果的辯論，而是分析了什麼可以稱謂共產主義的經濟成熟階段。因此，他首先揭發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科學區別。列寧寫道：

「馬克思沒有墜入烏托邦，但他關係這種將來所下的定義，要比現在所能下的還要詳盡些，這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與高級形態（程度，階段）的區別。」（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四三二頁）

爲了正確估計與正確了解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原則，必須注意以下要點：就是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者、認爲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具體問題流入毫無根據的猜測、是沒有必要的，甚至於是有害的。他們是由以下原則出發的：第一，社會主義的

4
本身將不是什麼不變的、永遠固定的，而是相反的，不斷成長與發展的；第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性質與方法，將大半決定於資本主義逼近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所達到的發展水準。

這兩種情況都在恩格斯致康拉德·斯密特的兩封信中，予以強調指出。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八月五日的一封信中，關於將來社會分配生產品的爭論，曾經表明自己的意見，這次爭論曾在當時社會主義雜誌「人民論壇」上進行。恩格斯指出在這次爭論中，對於問題未免過分用「唯物主義」態度跟各種關於公正的唯心論空談對立；但在爭論的過程中，誰也沒有想到分配的方法在實質上將依分配的生產品數量為轉移的，這種數量無疑地將隨着生產之發展與社會組織之進步而改變的。同時在爭論參加者的觀念中，社會主義社會好像不是經常改變的與進步的，而是穩固的、永遠確定的，因此它也應該有永遠確定的分配方法。恩格斯關於這次爭論的批評曾經作出以下的結論：

「健全的討論只可以：（一）試圖發現一種應該據以開始的分配方法，（二）努力找出一種應該遵循向前繼續發展的一般方向。」（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

十八卷，第二三三頁）

在另一封信中——一八九一年七月一日——恩格斯告訴斯密特關於他對於後者要製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的意見。勸告斯密特無論如何不要急於做這種工作。恩格斯寫道：

「這是一切現有問題中最困難的一個，因為各種條件正在不斷地改變，它們將因每一個新產生的托辣斯而改變，而且經過每一個十年，所有的出發點都可能完全轉移。」（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三二八頁）

曾有許多人次向馬克思與恩格斯請求，對於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給予更加詳細的說明。他們拒絕了這類過分的請求，解釋這類請求是不適當的。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提出的，就是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二月一日致考茨基的一封信。大概，考茨基是引舉國家社會黨的一些理由，後者「反駁」馬克思主義是根據它好像不能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口過剩問題。恩格斯回答考茨基道：

「假若國家社會黨人堅決要求我們無產階級社會黨人回答：我們將怎樣設想消除人

口過剩的威脅、及與此有關的新社會制度崩潰的危險，但由此完全不應該認為我必須滿足他們的願望。」

恩格斯繼續寫道：他認為爲這般先生解決他們的一切疑問，簡直是浪費時間，因爲這些疑問，是由「他們自己錯亂的超等聰明」產生的。在結論中，恩格斯非常堅決地告訴考茨基，他的問題是妄誕無稽的。他寫道：

「無論如何，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們已經自己可以解決，是否應該爲此採取某些步驟，並在什麼時候，怎樣和究竟採取什麼步驟。我不認爲自己應該向他們建議什麼或關於這個問題給他們忠告。這些人們無論如何不致比我們同你還要愚蠢。」（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七卷，第一〇七與一〇八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之意見的性質與意義，已由列寧與斯大林予以精當的確定。列寧關於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寫道：

「馬克思沒有一點企圖要創造烏托邦，空洞地揣測那種不能知道的事情。馬克思提出關於共產主義的問題，好像自然科學家提出新的生物變態之發展的問題一樣，我們已

經知道這種生物變態是如此發生的、而且按照一定方向改變形態的。」（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四二八頁）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曾經提出關於國家在共產主義下的作用問題。斯大林同志引舉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定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公式時，指出在這種公式中所研究的、不是某一個別國家的某種具體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社會主義國家一般的發展，並且假定社會主義已在多數國家獲得勝利的事實。因此，如斯大林同志所強調的，問題的研究在這裏是帶着一般的與抽象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創始者關於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意見必然帶着一般的性質。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為在他們手裏還沒有材料可以更加具體地討論這個問題，在他們在世的時候，還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經驗。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曾經說過：

「不能向離開我們時代已有四五至五五年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者、要求他們能預見到每一個別國家、在遼遠的將來一切和任何歷史的曲折。要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者、對

於一切和任何可以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後、在每一個別國家內發生的理論問題，爲我們作出現成的決定，以便我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者的後裔，能夠安安靜靜地睡在暖室裏咀嚼現成的決定，這簡直是笑話。」

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天才的領袖列寧與斯大林，還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就大規模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科學。列寧與斯大林堅決反對一切機會主義企圖要把馬克思主義變爲死的教條文集，高高舉起有生氣的、創造的、行動的馬克思主義旗幟，這種馬克思主義能夠發展、並且根據變化的歷史環境中、工人運動經驗之綜合正在順利地發展着。列寧關於社會主義有在一個國家勝利可能的原則，在新的歷史時代條件下代替了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同時勝利的陳舊原則，乃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勝利，按照新的原則，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問題。

列寧、斯大林的黨、走向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是完全武裝了對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精確知識，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一切方面，都有科學證明的與研究好的行動綱領。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舉行的布爾什維克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規定了黨要進行武

裝暴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又規定經濟綱領，這種綱領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套辦法，以便消滅經濟破壞與奠定社會主義經濟的柱石。這種綱領的基本要點，如所週知，就是一些根本的改革，例如沒收地主土地與實行全國土地國有、銀行國有、大工業國有，工人監督生產與分配。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列寧所寫的天才著作中，特別注意製訂各種經濟措施，這些措施都是預防經濟災難與由資本主義轉入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但同時列寧堅決批判了一切幻想家與空想家的企圖要猜測比較遼遠的將來，而沒有必需的現實的先決條件。

社會主義生產方法，乃是比較資本主義及一切其他存在過的生產方法、最高的一種生產方法。這首先表現於以下根本問題上，如經濟法則的性質，國家的經濟作用，財產的性質與勞動的性質。

這些根本問題，都已在列寧與斯大林創造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獲得解決，它是經濟科學的最偉大成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發展的最高階段，恰如社會主義是比較資本主義及一切過去存在過的生產方法一種最高的社會組織形式一樣。

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是意味着社會經濟發展性質的根本改變。這種情況，連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也早已預見到。恩格斯寫道：「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人們才一開始成為真正的主宰，而且是隨着他們成為自己的社會關係的主宰的程度為限度的。他們自己的社會行動規律，以及迄今與人類對立的、好似異己的與統治人類的自然界規律，在那時才能被人類完全自覺的運用，因而服從他們的統治。社會制度迄今對於人類，好像上天與歷史所賜的一樣，在那時也將成為他們自己的自由的事情。控制歷史的客觀外界力量，都將受人的管制。只有在這時人們才開始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在這時被他們推動的社會原因，才能在大半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獲得所希望的結果。這將是人類由必需的境界轉入自由境界的一種飛躍。」（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二八六——二八七頁）

在私有財產統治下，經濟法則是在人類志願與意識以外起作用的，同時個別人士行動的結果不僅不符合，而且時常甚至於和資本主義生產的代理人為自己定的目標相反。

在資本主義下，客觀的必然性通過經濟法則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些法則有兩個極重要的特點：第一、這些法則自發地起作用，在人類志願與意識以外爲自己開闢道路；第二、這些法則表現少數人對於社會成員極大多數的剝削。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寫了堆積如山的書籍，來擁護似乎永久的經濟生活不合理性。特別顯著的，就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巨頭及銀行與托辣斯的大亨們，在資本主義自發法則之前都表現無能爲力。甚至在他們已經看見危機必然接近的場合，他們也不能預防它。如所週知，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危機，曾經在資本巨頭中間，引起一連串的自殺浪潮。例如瑞典的火柴大王克萊格爾，美國製造電影膠片大王伊斯特曼、芝加哥肉罐頭大王斯維夫特及其他都自殺了。在我們今天，關於經濟危機的接近，不僅資產階級的報紙在說，而且在各國政府首長——如美國杜魯門與英國艾德利——的官方演說中，也說到這一點。生活告訴我們，資本的巨頭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自發性及其必然伴隨的危機的咆哮大海中，不過是些木屑碎片而已。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以事實的肯定語言、證明了不合理現象並不是一

定附屬於一切經濟，而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屬品。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發了以下原則的實質，那就是蘇維埃國民經濟——一個偉大國家的經濟——是組織得合理的、而且是按照計劃發展的。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中，已經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及自發的經濟法則的統治，客觀的必然性並未消失，但是它已被了解和認識了，它現在的作用是當作社會所定的一定目的。已經被認識和已變成我們整個社會行動目標的客觀必然性現在是怎樣表現的，這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中，像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這些例子，很容易看出來。

列寧與斯大林創造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在又揭發了附屬於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的新經濟法則。這是按照計劃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法則，擺脫了剝削的社會主義勞動的法則，以及城市與鄉村勞動大眾的物質福利及文化水準不斷增長的法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研究新的經濟範疇，這些範疇乃是人與人的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表現。

斯大林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曾經寫道：「在這裏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的

特徵，乃是解脫剝削的工作者的同志合作與社會主義互助的關係。」（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一版，第五五八頁）

同時列寧主義又教訓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發展、是經過矛盾之克服而進行的。列寧指出在共產主義下各種衝突都要消失，但還剩下矛盾。衝突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只有經過社會制度的革命變革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便是如此——它只有經過強力消滅資產階級生產關係才能解決，因為這種關係已經成了人類向前發展之道路的阻礙。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也是如此，只有經過消滅資產階級的統治與剝削階級才能解決。

共產主義的內部矛盾，却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它的第一階段就是在我國（蘇聯）已經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下，各種矛盾都帶着非衝突的性質，它們可以在蘇維埃社會前進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在反對資本主義殘餘的鬥爭過程中、以及在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過程中獲得解決。

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性質，曾由斯大林同志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

描寫如下：

「始終在我們這裏都有某種東西在生活中消失。但是消失的東西並不願簡單地消失，而要爭取自己的生存，堅持它過時的事業。始終在我們這裏都有某種新東西在生活中產生出來。但是生出的東西並不是簡單地生出來，而要發出尖銳的叫聲和呼喊，堅持它的生存權利。舊的與新的鬥爭，消失的與新生的鬥爭，——便是我們發展的基礎。」

在一切生活方面，發展着的社會關係，都在與舊的及消失的東西鬥爭中，開闢自己的道路。舊的與新的、消失的與新生的鬥爭，在社會主義社會一切生活方面不斷地發生着。

克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最重要工具，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列寧、斯大林的黨早就使這種揭發與克服社會主義矛盾的特殊形式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只要提及斯大林同志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開展，在斯達漢諾夫運動發生時期具有何等意義，就可以充分明白，當時生產革新家遭遇了默守陳規與停滯不進的擁護者、以及經濟建設中一切陳舊古老方法的代表所安置的阻礙。

作爲社會主義條件下新舊鬥爭特殊形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所具的巨大原則意義，已由日丹諾夫同志在哲學爭論中的發言揭發了出來：

「在我們蘇維埃社會內已經消滅了衝突階級，舊的與新的鬥爭，也就是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不是在敵對階級的鬥爭與突變的形式中發生的，好像在資本主義下所有的現象一樣，而是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形式中發生的，這種形式乃是我們發展的真正動力，實握在黨手中的強大工具。這無條件地是運動的新形態，發展的新風格，和新的辯證規律。」

斯大林同志揭發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他用科學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則在蘇維埃條件下的不適用，這些法則在剝奪了剝削者與消滅了資本主義關係以後，已經喪失了它們的力量。他指出意志中心主義者、冒險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之否認，以及宿命論者與復辟論者要把資本主義似乎「鐵的」與「永久的」自發法則之作用、推行於蘇維埃社會的企圖都已完全破產了。斯大林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無論按照形式和內容，都是根本與資本主義法則不同的，後者是建立在生

產資料的私有制，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及資本家與地主對於工農的階級剝削統治上。

在社會主義下客觀存在的經濟必然性，並不是像盲目的自發力量在那起作用，而是被認識的必然性，由黨與蘇維埃政府把它作為經濟政策與相當的國民經濟措施的基礎。列寧、斯大林黨與蘇維埃國家的政策，是根據極週密地了解與估計已經形成的經濟條件的科學原則而製訂的，此種政策本身又影響這些條件，改變它們使之適合社會主義利益與全蘇聯人民利益所要求的方針。

自覺運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法則的最一般的與包括一切的形式，就是國家的國民經濟設計。斯大林同志證明了在資本主義下，當政權屬於資產階級及生產資料仍為產資階級與地主的所有財產時，國民經濟計劃化是不可能的。同時斯大林同志又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國民經濟按照計劃發展是必要而且可能的，因為在這種社會內，政權已屬於城市與鄉村的勞動者，而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的社會主義財產。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及以公有制代替它，必然破壞自發的經濟法則的作用。

還在社會主義建設開始階段，列寧就強調全民核算、監督生產與監督分配生產品的